



中国经济 发展模式转型： 理论与政策

王今朝 龙 斧 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

王今朝 龙 斧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针对中国过去 33 年所形成之经济发展模式,两位作者基于对中国过去十余年既有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决策,如股改、扩需、构建和谐之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之研究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政治之学识,交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经济社会学、逻辑学、公共管理学、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等理论和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否定陷于纯粹经济学之封闭系统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宏观需求管理理论并确立发展模式概念科学内涵基础上,就中国所有权、价格管理、技术进步、企业治理、财政制度、金融安排、对外关系七大有机关联基础领域提出了一种能够实现广泛社会动员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因而能够重新确立中国原有独特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和政策体系。

本书尤其适合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和未来领导参阅。它也可供那些致力于求解当今世界最重大经济、社会、制度问题的发达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和民间人士的参阅,同时也适合于那些对经济的规律、趋势、方法论等学术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学子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与政策/王今朝,龙斧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3-032435-1

I. ①中… II. ①王… ②龙…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IV. ①F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7095 号

责任编辑:马 跃 / 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蓝正设计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 蕾 印 刷 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印数:1—2 000 字数:320 000

定价:42.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言

一、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的关系——本书目的

经济发展模式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影响，所以，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就是发展战略的转变。本书因而也就成为研究中国新发展战略的专著。中国发展战略无疑具有其自身的特性，许多在中国可能的事情在其他国家并不可能。然而，纵观 1978 年后中国发展战略制定的历史，有三个带有共性的问题需要厘清。

首先，发展战略不能混同于具体的经济政策。从逻辑上看，发展战略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具体政策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发展战略与具体政策在目的、目标以及实现它们的手段数量的对应等方面具有根本性差异。^① 政策所要实现的是具体的目标（如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要达到这些具体目标，可能必须并行采取相同数量的经济政策手段（丁伯根 1991）。这些手段不过是政府支出水平、税收水平和货币供给增长率之类。发展战略所涉及的目标更为根本（如社会和谐），并且实现它的手段须有主次之分。

关于两者的关系，用丁伯根（1991）的话说，社会经济政策是社会制度实施（即发展战略）所运用的手段。一个战略确立之后，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来定义和实施。然而，战略与政策之间的关系类似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纵然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对前者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表现之一就是，没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定位，政策制定就缺乏明确的目的定位。缺乏战略定位指导的政策制定最终必然导致用具体政策来替代发展战略这种“用脚去指挥头”、“屁股决定脑袋”之类的事情。当前不少研究以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仅仅是解决高碳排放、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地区不平衡、收入不均、内需不足、外汇损失等具体问题，无论其运用怎样的工具进行分析，都犯了混淆具体政策与发展战略的错误，都意味着把现有制度作为不变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去寻找能使发展更为科学的各种制度的集合。从已经提出的解决方案看，它们中的一两个问题的

^① 许多世界著名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都是用政策来替代战略。例如，美国 MIT 教授 A. 布兰查德就提出了这样一种平衡中国发展的政策组合：用更有效的退休制度、医疗保险供给、私人保险市场培育、更加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得银行更多对项目而非对抵押品发放贷款）来消除高预防性储蓄；允许人民币升值；增加医疗服务和其他服务的提供。参见布兰查德和贾瓦茨（2007）。



解决固然可能与科学的发展战略相一致，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案却与科学发展战略背道而驰，从而属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社会论。

其次，在战略制定上不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当前，一些研究虽然是在战略层面上讨论发展转型问题，但由于主张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从而完全陷入逻辑混乱、牵强附会、西方月亮比中国圆的荒谬境地。在这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引领下，它们既表现出思想观上的极端化（只有市场经济、私有化才能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失败），又有因此导致方法论上的简单化〔总产值、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发展压倒一切等〕（龙斧，王今朝 2011）。由此产生的发展模式转型研究不仅带有极强的西方原始和大工业资本发展模式色彩，而且在指导理论上带有明显的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曲解化或直接加以否定的色彩。它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与研究采取“挂羊头卖狗肉”的方法，用主观性的西方理论框架去评价、解释、指导、衡量、引领中国实践^①，把一些在西方本都没有什么实践指导性的西方经济理论（从西方都已全面批判的一般均衡、短缺、产权到资源配置、比较优势，从公地悲剧、集体行动逻辑到西方都已摒弃的原始资本和大工业资本发展时期的“激励机制”，不一而足）奉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金科玉律^②，因此形成了武断否定社会主义发展史（如经济崩溃论、计划经济无效率论^③等，从而也否定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著名论断）的国内经济学“主流”，相比之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改革、模式转型、政策形成等方面的实质性影响和指导却相形见绌，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构、功能、目的以及相匹配的价值观所赖以确立的物质基础被蚕食、被否定并逐步消失。

最后，在战略制定上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当今，西方强权国家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银行体系和强势货币，制定了利于霸权利益的国际规则，操控了国际资本市场、高技术工业产品市场，占据了在国际上行使道德领导力量的高地，对有战略价值的第三世界弱国进行着大规模军事干预，扼守海路要冲，控制最高端的科技研发，主控太空计划、航天工业、国际传媒网络、军火工业，获取和消费

① 如对仅存的大型国企（并不缺少“资本”）还要延续原有的私有资本介入模式，公立医院也要采用原有的“社会化”模式（实际是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对国防工业也要采用所谓的“股份制”改造模式。

② 两位欧洲著名学者（意大利 Roma 大学的 M. C. Marcuzzo 教授和奥地利 Graz 大学的 H. D. Kurz 教授）在武汉大学访问时对中国高校那种不遗余力地引进美国教材（排斥欧洲、排斥专著）表示惊疑（因意想不到）和质疑（因有明显的可以改进的余地）。如今中国经济研究走上形而上学道路与盲目引进美国经济学教材关系甚大。

③ 很多学者把“大跃进”的错误理解为公有制的必然结果，而没有看到，它不过是转型过程中因决策失误+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当时人均粮食产量还很低+一穷二白+政府初创）而产生的一时性错误。从世界各国转型的经验看，也不能夸大这种后果。

着世界上大部分自然资源（杭廷顿 1997）。中国的发展战略正面对着这种强权，发展模式的选择无法不受影响。中国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如果掩耳盗铃地漠视西方强权存在的上述事实，就会产生类似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那样的丧失自我的悲剧性结果。^① 中国如果以我为主，从制度、战略、发展方向、性质以及指导理论之高度对现有模式加以思考并重新定位，就能把握历史赋予的契机，即为发展中国家、民族树立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路径的，结合自身条件和特性的，以社会平等、公平、正义为宗旨的（西方自己的发展也表明 GDP 本身对这一点不起作用）经济发展模式。这样来看，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选择和思考以及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也是一个超越国界、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2007）。

本书提纲设计和论证过程严格遵循上述三点，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指导本书概念、方法、理论和政策的论述，以期得出一个可以经得起理论推敲的关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的理论体系出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在经历了前 30 年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经历了 32 年的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时期之后，尤其是经历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的快速和全面私有化、商业化、市场化、利润化发展模式后，中国重提发展模式的转换，就表明中国过去 32 年的发展战略走到了拐点之处，所蕴含的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方面）的根本性转变，而不是它的“GDP 压倒一切”为目的的边际优化和调整。只有在发展战略实行了根本性转变之后，边际优化和调整才有意义。没有根本性转变，发展模式优化最多不过是如次优理论所指示的那样使事情越来越恶化。由于前 30 年经济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时期，这就正好符合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中国提出发展模式的转变问题，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体现。违背这一规律而谈论发展模式转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指导理论”也就成为“叶公好龙”。

二、本书的思想观认识

关于发展模式，在不同抽象水平上，考虑不同长度的时间区间，就会有不同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的构造、选取反映思想观和方法论。例如，格里芬（1992）根据整体性、实证性和术语规范性三个标准^②，概括了六种发展战略，即货币主义、开放经济、工业化、绿色革命、再分配和社会主义。钱纳里等（1989）给出了另外几种可能的发展战略的分类。而世界银行则提出了“华

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充满了矛盾，并且许多是对抗性矛盾。赫鲁晓夫不是什么理论家，但他提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概念，还带有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点的色彩。

② 所谓整体性，是指这种战略事关经济整体，对整体产生影响；所谓实证性，是指这种战略可以用变量来定义和度量；所谓术语规范性，是指这种战略是大家共同使用的语言。

盛顿共识”的发展战略。相对于库兹涅茨的概括（更不用提“华盛顿共识”），本书较为赞同格里芬、钱纳里等分析的思想观和方法论，但又与之有根本性的差异：本书思想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其基本思路是，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是消除社会矛盾，平等分配经济利益的战略。^①同时，这一战略的确立必须置于科学的理论框架之中。

对以人类平等、公平、正义为宗旨的社会发展模式来说，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目前关于社会发展的最科学理论框架。其科学性首先是因为它的人民性，而且这个人民性既包括大多数人也包括少数人，同时包括这两类人群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平等性、公平性和正义性。其次，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一致。没有这个一致性，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就无从谈起，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反映、树立、宣扬、坚持这一科学性也就无从谈起（至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对于世界人口最多、资源最为贫乏、不平等、不公平、非正义封建等级社会历史最长、影响最为牢固、深厚的中国来说，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经济学比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经济学更为正确、更为科学，这一点已经为1949~1976年的中国实践所证明，也为1976~2010年的历史实践所证明，还将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证明。从理论上讲，假设其他情况、条件、环境和历史路径一样，“当家做主”的多数人的力量和因此产生的效益一定远远大于少数人统治、支配下的“多数人沦为雇佣劳动力”机制下产生的力量与效益，而这一点不仅为1949~1976年的中国实践所证明，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弱胜强”的实践所证明。从实践上看，多数人一旦明白他们的“人民性”、“社会主人性”、“当家做主性”，效益性、创新性、主观能动性都会激发出来，对探索、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承认就不会因为保证“利益集团”格局下的稳定、GDP增长率、不出乱而“欲说还休”，对于错误的纠正就会因对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真心想追求而“欲罢不能”。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因为它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观和方法论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在看待少数人与多数人在生存条件、剩余占有博弈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概括出的阶级斗争概念抓住了一切社会发展问题的核心、根源和焦点。阶级斗争的存在性是客观的，但其性质的差异性也是客观的，对待不同性质的阶级矛盾的解决手段是不同的。既不能把次要的矛盾主要化，也不能把尖锐的斗争调和化。其他的大多数西

^① 平等与效率矛盾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把平等与效率对立起来是庸人哲学。参见本书第三章的论证，也请看诺贝尔奖得主如丁伯根、米德、森、米尔达尔、奥斯特罗姆等的相关论述（不少论述本书已经加以引用），也请思量毛泽东一代人1921~1966年平等实践的哲学意义。

方社会科学流派要么限于分析次要矛盾，要么用孤立的眼光看待主要矛盾^①，对解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问题都只能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②

当代西方极端的经济理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都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彻底否定。新古典主义理论把市场说成万能，认为供求决定一切。一般均衡理论正好证伪这种观点，却反被说成是证真。函数关系意义上的供求决定价格纯属臆造（参见第四章），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物以稀为贵常识的移情。凯恩斯主义虽然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万能论，但它把财政政策赋予一种万能杠杆的神奇功力，似乎这种社会功能运作之一隅即可撬动社会整体运作。这种理论能够否定乃至取代马克思从社会细胞出发所进行的社会生理学研究吗？是否资本主义只要充分就业，剩余价值剥削就得到了消除，危机就得以避免呢？答案是，在政府财政平等而有效地运作，在就业更充分的同时，资本家的剥削却越大、越充分，资本主义矛盾也就越深重。^③由此可见，就业只是社会功能运作之一，把它视为社会“头号问题”，完全是本末倒置。更何况，凯恩斯主义所寄予厚望的乘数效应，其数值非常有限，综合效应非常糟糕。因此，虽然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不同，但所起到的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与后者其实并无二致。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如果把其自身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在市场经济、供求分析上，不啻正式宣布放弃已为实践证实其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数典忘祖”的发展战略是十分可笑又危险的。

类似上述极端理论或改良后的凯恩斯理论今天在西方也受到广泛质疑，而西方发展的具体政策以及构成的发展模式也并未对这些极端、改良理论全盘照搬（如克林顿、奥巴马以及早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政府^④）。可是，中国今天极少数学者既对凯恩斯主义情有独钟^⑤，又对新古典主义顶礼膜拜，表现出在行为上既歪曲历史，又毫无逻辑，既不懂理论，又缺乏常识，从来没有用逻辑、历史、理论、常识去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理论问题，貌似博学，实际上是

① 科恩（1988）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是民主的经济基础观点的批评就具有这种性质。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也具有同样性质。当一个社会分化为对立的阶级的时候，一个阶级的自由就是另一个阶级的奴役。这时候，还怎么用自由来看待发展呢？

② 当然，西方也有不少理论（如 E. Ostrom 的公共资源治理理论）可以用于补充马克思主义，毕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大的框架，还有待许多具体知识去填充。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主义过于陈旧而推崇“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框架科学而稳定，真正的学者当然要反复回到马克思那里。

③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著名学者”不明所以，每当社会出现问题就强调促进就业，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正是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就业为前提的。片面强调就业就是假马克思主义。

④ 中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一些运动非常相似，这有一些美国当时的纪录片为证。

⑤ 凯恩斯主义冲击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基本判断的社会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凯恩斯主义的科学性。

人云亦云，是中国知识分子躯体上载着一颗西方应声虫的脑袋。奈特（2006）针对西方学界和权力界脱离实际、臆造理论的现象而指出：“学者们在提出‘基本原理’的时候，自己在心里都没有对假设进行清楚的定义，所以他们以及那些以此为自己的基础的实际工作者，当然会忘掉原先提出的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他们会全盘接过这种原理，并将这些原理运用到自己的具体实际中，再从中得出完全没有保证的结论。”西方已经这样，中国那些迷信西方者更是如此。中国不少学者还完全接受了西方所谓“实证经济学”方法，以为自己可以摆脱立场问题、价值判断问题，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超脱者。可是，谁这样想，谁就是思想观错误，谁就没有思维能力，谁就是没有读懂几本书。加尔布雷思（2008）说：“很少有人相信，又没有人愿意在出版物中解释，却能够一代又一代相传的观点是存在的。”这就说明：西方 $\neq$ 真理，学术 $\neq$ 真理，名校 $\neq$ 真理。诺贝尔奖得主索洛（2007）说，那些真正严肃对待学术的社会科学家，“跟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和各种价值判断，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跟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意识形态、利益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不论社会科学家对此是否承认，也不论对此是否知道，甚至哪怕他对此表示反对，然而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话语，都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本来，这些观点并不高深，并不难懂，中国那些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说，一个人自相矛盾的思想能够反映其阶级倾向（亨特 2007），那么，自相矛盾的行为就更是如此了。今天许多西方学者承认阶级的客观性，许多中国学者却讳言阶级、阶级斗争。这既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之操守，也非其应有之水平。^① 在应有操守和水平双重缺失下，宣扬“尊师重教”、“知识至上”来“迫使无知之人遵从有识之士”（奈特 2006）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它不过是把神学观点带到大学校园，把现代社会的学院变成中世纪的经院，把知识创生之地变成歌舞演绎之园、名利攫取之场罢了。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要求巨大的社会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真正关于发展、变化的科学。唯有以它为指导，才可能达到理论内在的一致性以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加尔布雷思（2008）说，在历史上和在任何地方，生活小康和富裕的人（从统计上说）都是怀疑变化的，变化对于拥有财富的人总是代价很大。拥有财富后，不仅个人容易接受保守主义，国家也容易成为保守主义的堡垒。今天，中国还不富裕，人均收入和人均实际收入在国际上还“名落孙山”，贫富差别、两极分化却“榜上有名”，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利益集团的形成触

^① 今天，中国流行对道德、操守的蔑视，这不是一般百姓中蔑视道德、操守的那些人的过错。当知识界被错误的思想观和方法论支配（从而必然丧失基本的诚实），还能让社会讲究诚信吗？

目惊心。这些都无法体现其发展模式达到社会平等、公平、正义这一目的，更谈不上什么值得别人学习借鉴的“科学发展观”。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全面私有化、商业化、市场化、利润化倾向并非什么“一个独特的、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的经济发展模式，无论一些部门或官员专人、专款来试图把中国模式硬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模式从而达到各种理论和个人目的，都是牵强附会、逻辑混乱、一旦登上学术和理论舞台将为历史和未来所唾弃的徒劳之举。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在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中来，就像当年第五次反围剿后我们的党、军队和群众又回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中来一样；还是让我们回到用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社会平等、公平、正义定位的“科学发展观”中来，非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

以上就构成本书的思想观认识。

三、本书的方法论认识

如同思想观一样，方法论也是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从哲学上看，存在两种对立的方法论。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另一种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一些作者本身看起来没有系统的方法论，但他们言必称哈佛、耶鲁，实际上也是一种方法论。哈佛、耶鲁自有其独到之处，但把哈佛、耶鲁的经济学课程中的某项设置看成是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模式，把西方对某种数量方法的运用当成是中国学者进行研究的必备特征，这与当年王明回到中国宣称自己是最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两样，而那些受此谬论影响丧失自我者与那些当年深受王明“左倾”和右倾影响者没有两样。^① 鉴此，本书的方法论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它建立在结构分析基础之上。结构分析不是把决策单位看成一个个孤立的决策主体，更不是把决策主体仅仅限于个人、家庭和企业，而是涉及许多关系以及相互作用。^② 许多学者都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是结构性变化问题，不是边际改善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结构变化不应是由于错误战略定位下的数量变化逐渐引起，而是首先做出科学的结构性变化的决策，再逐步引起、容纳数量的变化。这意味着，不能运用福利经济学的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只有使用结构分析的方法，而不是那种代表性主体目标函数最大化方法，才能与“经济发展模

^① 关于这点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参见胡乔木（1994）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部分（第64～77页）和关于编辑党的历史文献、整风运动和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和“历史草案”的部分（第175～232页）。

^② 发展经济学中有结构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也进行结构分析，中国的新政治经济学把所有制结构看成一个根本问题。本书的结构分析着眼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关注生产关系结构、国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式转换包含了对过去 30 年发展模式、结构的辩证否定”的事实相一致。

第二，它建立在逻辑因果定性分析基础之上。在社会科学相互对立的理论中，真理往往只有一个，错误却可能百出。就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是毛泽东所指示，而错误的道路却包括教条主义、盲动主义、宗派主义一样。理论研究的目的之一本来是“证伪”那些错误的理论。可是，这一任务人类至今并没有根本完成。在当今世界，存在许多竞争性理论，它们往往建立起完全相反的逻辑关系和定量关系。建立在错误理论、错误逻辑关系基础上的任何定量分析，不管其使用怎样的方法，都只能是假意识（龙斧，王今朝 2011）。^① 这样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研究就必须首先以理论框架的选择为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参数估计意义上的数量化的研究才能提上研究的日程。^② 对于发展模式转型真正重要的结论应建立在因果关系而不应建立在统计关系的分析上。

第三，它对定性分析采取一种多元非线性的研究方法。其包括：①从数学上看，这种方法的本质就是不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政治现象看做是简单一元线性关系（但不排除理论上的根本性决定关系，这是主要矛盾观点），而是看做多元的非线性关系（这是次要矛盾观点）。此外，我们考虑问题的时间长度使得发展模式的决定根本不可能有简单一元关系。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数学上的一元或多元线性函数作为规律只能在短期内成立。用一元或多元的线性关系来看待长期的经济发展现象只能是假意识。②本书对许多流行观点采取驳斥态度。例如，不少人把“人类生活是仅仅为获取任何真正想要的东西而采取的行动（消费和生产）”看做是普适性的经济原理。而我们却同意奈特（2006）对这种表述的意见——既肤浅又不真实。

第四，它以整体制度分析为手段，同时采取交叉科学分析方法。其包括：①本书必然采取制度分析。没有制度的约束，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制度的变化，就没有明天发展模式的优化。②本书采用的制度分析必然是整体意义的。Williamson（1985）采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着眼于导致个人和企业各类交易中的行为模式的规则和行为准则，因而选择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作为行为假设的起点。对于本书而言，它们都不重要。运用本书的结论于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最小化问题，其结论将根本改变。③经济系统总是向非经济力量和机遇的作用开放，后者也向前者开放，大多数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涉及用更为合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来安排生产、生活。这就不再仅是纯经济的问题，而且是政治学的问题、社会学的问题、心理学的问题、文化学的问题、哲学的问题

① 这里，还有现代数量方法的适用性问题。越复杂的方法就越不稳定，对数据的要求就越严格。

② 其实，定性分析以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为对象，本身就包含了某种定量分析。正如龙斧和王今朝（2011）序言所指出的，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也没有定量优于定性的绝对性。

题、管理学的问题、信息学的问题，所以，本书采用了一种交叉学科的开放性分析方法。

上述方法的应用必然使本书成为一本应用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专著。今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相对于 1978 年以来所形成的发展模式而言的。1978 年后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是相对于 1949~1976 年所形成的发展模式而言的。这种相对性必然是以对前者的某种否定而形成的。如果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可得出一种结论，即今天的将要转向的发展模式与 1949~1976 年的发展模式将有某种关联性、相似性 [龙斧和王今朝 (2009b) 提出了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学术观点]。特别是，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框架，1949~1976 年的发展模式所蕴含的原理就是今天中国发展模式转型所要依据的原理。而这样一来，1978 年后所形成的发展模式如何形成、有什么问题，也就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了。

四、本书结构安排和期望

运用上述方法，我们识别出所有制-生产关系作为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转型的最根本决定变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普遍联系、次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普遍联系的观点，选定了价格体系、技术进步、企业治理、财政、货币、对外经济关系等六个方面加以论述。最后，本书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应用。这便是全书的框架。内容有国内分析、国际分析、经济本体分析、政府政策分析。

本书引用了许多著名学者，如诺贝尔奖得主 Tinbergen、Meade、Myrdal、Stiglitz、Ostrom 等，以及世界著名经济学家 Galbrath、Robinson、美国著名法官 R. A. Posner 等的观点，但对他们的知识“负债”并不太深，因为这些引用的观点很多都是书稿基本完成后才发现的。这些学者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褫其华袞，示其体肤”的识见。本书的完成不仅是在了解他们的观点之前，而且在基本论点上较它们更进一步。本书的初稿是在与龙斧教授合作撰写《社会和谐决定论：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重大理论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一书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一作者不仅将从龙斧教授那里系统学习到的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应用于本书的写作，还从龙斧教授那里承继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许多新颖理论观点，从而使得本书事实上成为融二者人生指向、经验、研究、学识于一体的著作。

尽管本书已经尽可能严谨、科学，但我们猜想，仍会有某些“学者”或者认为它不着边际，或者把它置之不理，甚者或对它大加挞伐。毕竟，不同人之间在人生学识、经验、能力、指向、志趣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同，文人相轻也是中国社会一大陋习。对于前面两种情况，我们置之不理，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们以“走



自己的路，让他人去说”自解。对于那些希望真心从本书系统了解经济发展科学观点的读者，本书大量引用西方著名学者观点加以旁证。然而，应该指出，本书对引用做了尽可能地节省。例如，在金融方面，本书与大批畅销书作家观点一致，如史蒂文·希亚特的《货币阴谋——全球化背后的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以及它在第四页所提及的戴维·克顿的《当公司统治世界》、诺阿姆·乔姆斯基的《霸权和生存》、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杰夫·福克斯的《全球阶级斗争》、安东尼娅·尤哈斯的《布什议程》。又如，在方法论上，本书与许多西方学者观点一致。这可以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学方法论新论》加以证明。把这些后来发现的内容引入书中，尽管对读者会有帮助，但会使其因篇幅太长而变得芜杂，因而只限于在这里加以提示。

本书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来自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得自于我们在中美所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我们的师长的言传身教，得自对《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诸多文献的阅读，得自今天网上的许多现实材料，也从阅读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性著作如《资本主义发展论》（保罗·斯威齐著）和《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保罗·巴兰著）和埃及著名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的代表作《不平等的发展》中获益匪浅。

通过本书问题导向（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分析，我们希望，除了廓清发展模式转型这一问题以供学者、学生和政府官员参考之外，还可以达到一种文字功效，即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所谓准确性，就是概念、判断和推理要清晰；而鲜明性就是明确是非；生动性就是辞章表达活泼直白。如果中国学者、学子在这三大方面有了真正的提高，则中国社会科学的兴盛和中国发展模式的科学转型是指日可待的。考虑到今天世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不乏逻辑混乱、牵强附会^①，或者局部正确而全局错误，或者短期内正确而长期内错误，本书的努力是值得的。是否达到了这三个标准，有待于读者的判断。

^① 例如，Krueger（1997）就认为，许多贸易政策就是靠“粗略的印象、真伪各半的理论推断”做出的。

目 录

序言

第一章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模式	1
第一节 经济发展及其模式	3
第二节 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因素	6
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定位	8
第二章 文献和研究方法辨析	16
第一节 新古典发展理论批判	16
第二节 新古典方法论批判	24
第三节 中国流行发展观点和方法批判	30
第四节 本书的方法论体系	37
第三章 生产资料所有权安排与经济发展模式	42
第一节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量	43
第二节 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比较	59
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实证	73
第四章 价格管理：由偏向市场向偏向控制转变	78
第一节 作为假意识的供求决定价格规律	79
第二节 形而上学的一般均衡论和货币数量论	82
第三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价格	87
第四节 调整价格至引致生产的最低水平	97
第五节 提高工人和农民收入	101
第六节 结论	102
第五章 技术进步的策略选择：由偏向自由向偏向集中转变	103
第一节 对象的锁定	103
第二节 1978年后中国技术进步战略存在的问题	107
第三节 技术进步策略的伪命题和真命题	109
第四节 中国技术进步转型的政策选择	114
第五节 结论	119
第六章 公有企业治理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120
第一节 方法论和框架	122



第二节 外部的政治制度——校正国家的功能、行为	127
第三节 企业领导人选择——校正一级委托代理关系	130
第四节 公有企业内部的治理——校正二级委托代理关系	132
第五节 转变治理结构的复杂性	140
第六节 结论	143
第七章 财政结构：由复杂向简单转变	146
第一节 科学的经济社会结构	147
第二节 科学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财政制度含义	154
第三节 税收和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	161
第四节 结论	167
第八章 金融结构：由深化向浅化转变	169
第一节 科学的经济社会结构的金融结构含义	169
第二节 中国金融结构的转变	178
第三节 结论	186
第九章 对外经济关系：由高开放度向低开放度转变	188
第一节 中国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的理论和历史考察	189
第二节 1978~2010 年贸易规模的扩大及自身问题	193
第三节 汇率低估的损害	198
第四节 外贸、外汇政策的转型	202
第十章 理论的一些应用	210
第十一章 结语	225
参考文献	228
致谢	239

第一章

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模式

发展模式或增长方式转型研究已经很多，不少人都同意甚至高唱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转型。可是，关于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发展模式的内涵，什么是决定发展模式的变量体系，他们的许多观点、表述都存在思想观片面化和方法论简单化问题：因认为西方经济发达其模式也必然科学而在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照搬西方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模式，表面上较为严谨，实际上在框架选择上具有任意性，从而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例如，不少研究抛开马克思主义，用新古典增长或新增长理论^①，或用西方产权经济学（平乔维奇 1999），对中国发展模式转型进行分析。抛开阶级对立、利益集团胡乱地（绝对地、抽象地、孤立地、静止地）理解描述西方经济运行的激励、创新、竞争、价格、信息，这就把西方学界部分学者对于西方经济进行“片面”分析的“一面之词”当成了普适于世界的真理。

使用片面化思想观和简单化方法论既无法解释历史^②，又无法说明现实。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演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最科学的模式，那么，马克思主义岂不就是要用“落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人类历史上“最科学”的资本主义制度吗？那中国还非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呢？那美国怎么还会发生金融危机呢？那美国许多新自由主义学者为什么还要改弦更张，质疑所谓主流理论干什么？^③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演绎，蒋介石政权岂不根本不会失败，中国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又有何必要，成功又有何可能呢？毛泽东一代人岂不是根本不必剥夺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他们岂不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家族企业？按照这种观点的

① 这两个理论都继承了庸俗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这是问题的关键。从世界经验看，生产要素论一旦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可，公有制社会就可以变为私有制社会。

② 西方学者中不少人认为，历史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许多理论尽管精美，但如果没有历史，甚至与历史事实相悖，就不可能正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之一就是赋予历史以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地位。

③ 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些作者由于具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从而能够在智力上应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的逻辑分析能力是有限度的。真正厉害的逻辑分析能力能够见事于未萌。有的人，因为立场的原因，倒不一定因为逻辑分析能力，更早地接触、接受马克思主义，反而能够在理论分析上占领先机。共产党的创立者们许多都是大理论家，并非偶然。反观西方，其领导人却极少是理论家。

逻辑演绎，20世纪90年代后的片面私有化已使中国承受巨大代价也就无所谓。^①不管这种代价是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官商勾结所形成的巨额社会成本（龙斧，王今朝 2009b），还是不平等交换所隐藏的巨大的掠夺（王今朝，龙斧 2009b），还是雇佣劳动盛行导致工人和农民社会主人公地位的丧失^②，还是中国巨大贸易顺差背后所隐藏的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合理，还是中国企业2008年在美国市场与国际石油和铁矿石市场上的巨大损失。在这种观点看来，这些损失的发生（它们加起来高达几万亿美元）是因为中国还不够现代（实际是现代资本主义）。如果仅此而已，在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马关条约、日本侵华就岂不都可以归结为中国不现代？这种不现代难道不正是旧中国几千年私有制的同义语吗？从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她的公有制建立的过程中，还看得到中国被动挨打、丧权割地的一丁点屈辱吗！可是，片面化思想观和简单化方法论根本不会这样理解问题。这种片面化思想观和简单化方法论根本是非学者、非科学的态度。与这种简单、片面观点不同，30年前，首届诺贝尔奖得主丁伯根（1991）就主张一种平等的社会经济结构。尽管丁伯根的民主社会主义根本不同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可是，中国目前流行的简单化、片面化观点连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都不是。这种不管历史、不管国情、不管逻辑的片面化思想观、简单化方法论之下的发展理论，无论其运用了怎样的数学模型，都无法可靠。运用的模型越复杂，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越不相关；将其运用于指导中国发展转型，发展模式就越糟糕。

片面化思想观和简单化方法论必然使用极度抽象术语进行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既具有世界的共性，又具有民族的特性。片面化思想观和简单化方法论或者一方面用世界的共性来替代民族的特性，另一方面又能脱离世界的共性谈论民族的特性，或者一方面用错误理解的共性替代正确的应然的共性，另一方面用错误理解的特性来替代正确的应然的特性。为了避免陷入片面化思想观和简单化方法论陷阱，第一章第一节就必须从发展定义、发展模式定义、发展目的展开探讨。

①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渐进改革，但人民公社一夜之间的解散、国有企业的出售转让却不能说是渐进的。毛泽东所珍爱的人民公社制度、公有制制度的被抛弃不是用简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能回答的。据说，胡耀邦对于这一命题在后来评价并不高。

② 温家宝在2011年3月14日的记者会上指出，“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已经超过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就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参见温家宝。不存在“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问题，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03/14/content_22134311.htm，2011-3-16。